

北

大

记

忆

于

／

『琐细零碎』中

洞见历史的

／

细部

感受

／

历史血脉的搏动

未名湖畔的 足迹

周先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未名湖畔的足迹

周先慎 著

一
北
大
记
忆
一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名湖畔的足迹 / 周先慎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5
(北大记忆)

ISBN 978-7-301-29012-5

I. ①未… II. ①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4113 号

- 书 名 未名湖畔的足迹
WEIMING HUPAN DE ZUJI
- 著作责任者 周先慎 著
- 责任编辑 于铁红 周彬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9012-5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 电子信箱 pkupw@qq.com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 印 刷 者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6 开本 22 印张 245 千字
-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52.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序

我今年12月5日满八十周岁。用传统的典雅一点的说法，是到了杖朝之年；换成时下带点俏皮意味的说法，则是成了另类的“80后”。人已经活到了这个年纪，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都该是对逝去的岁月作一次回顾和对此前的人生行迹作一次盘点的时候了。从过去写的散文随笔中，选出一部分今天读起来觉得也还有些意味和保存价值的，结集成书出版，这也是回顾和盘点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

即使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处于相似的大环境之中，人生也会各不相同。和一些人比起来，我没有他们的成功、荣耀、地位，以及因此而带有的绚丽色彩；和另一些人比起来，我没有他们的坎坷、沉沦、苦难，以及与此相伴而生多半会有的传奇色彩。我的一生只是简单的六个字：平凡，平淡，平安。平凡是出自本色，平淡是基于事实，平安是因为我的命好。

打从我成人开始，阶级斗争就一浪高过一浪。亲身经历而于我最为惊险的，是“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但我都没有被恶浪卷走、淹死，而只在身上溅了几点泥水。刚入大学的时候，赶上过一段

很短的好日子。1956年党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广大学生热烈响应，掀起了很高的学习热潮。学校为了鼓励大家努力学习，第一学年结束后还进行了评选三好生和优秀生的活动。我因为在第一学年中全部课程都得了优等，其他方面的表现也不错，成为全年级八十多人中仅有的两名优秀生之一。可是时过不久，风向就突然大变。1957年春夏之交，在党号召大家大鸣大放之后不久，就掀起了来势凶猛的反右派斗争，我们年级在二十岁左右的同学中，竟划了八个右派分子，比例是十分之一。政治风向一变，我的角色也就跟着朝相反的方向转变。1958年，当时我还只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反右斗争还没有最后结束，又掀起了拔“白旗”和批判“白专”道路的运动。在政治的风起浪涌中，我这个不久前的“优秀生”突然又变成了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并且还要在全校大会上发言，批判自己的个人主义和成名成家思想。第二天的报纸上报道说，因为走“白专道路”，周某人“险些陷入右派泥潭”。家人看了心惊肉跳，我却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反而比较安心了。“险些”就是“险些”，直白地说就是“还没有”，这算是暗中给了我一个不会“再滑下去”的结论。不过因为思想“右倾”，还是被撤掉了团支部书记的职务，还受到了团内警告处分。

除了无可选择的家庭出身不好，这次又加上了我本人的“政治污点”，装进随着自己走到哪儿跟到哪儿的档案袋里，是一辈子都甩不掉也洗不干净的了。

但是家庭出身不好也罢，本人的政治污点也罢，虽然在我自身已经成为一个很沉重的思想包袱，但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政治上十分敏感的时期，对我却好像并没有什么大的负面影响。从四川大学毕业时，尽管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到新疆（当时这样填报的人不止我一个），却被分配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这样的近乎鬼使神差和阴差阳错的安排，若不是因为命好，怎么都无法解释。

那时候的北大（其他院校也大体一样），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基本

上都是“近亲繁殖”，也就是师资几乎都是清一色从本校的毕业生中留用，不像今天有了硕士、博士培养和博士后流动站制度，可以实现全国的大交流。像我这样从外校分配到北大来工作的本科毕业生，除了这一年，可说是史无前例。幸运的是，我到北大工作后，没有因为是“外来户”而受到歧视，更没有被调离，而是一直心情愉快、顺顺当地工作到2001年退休。这当然是受惠于蔡元培校长所开创的北大兼容并包的历史传统。

更加幸运的是，在“文革”中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五七干校，环境十分恶劣，劳动极其紧张，两年后我竟又平安地回到了北大。那里大堤外的水面比大堤内我们居住的房顶还要高，时常有惊涛骇浪令人闻声色变，也确有人被恶浪吞没而葬身湖水，而我也同样幸运，没有被巨浪卷走。开门办学，同行的师生中有两人因为翻车而罹难，我因坐在另一辆车上又与死神擦肩而过，安然地躲过了一劫。细细想来，这一切好像都是因为有上天眷顾，真的是命好。

从1959年到北大中文系担任教职，至今我已经在未名湖畔的燕园工作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集子中的这些文章，清晰地记录下我在未名湖畔留下的人生足迹。

全书按内容的不同分为八辑。前三辑主要是直接写在北大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其中既有鲜活的生活场景，也有终生铭刻不忘的内心感受，还有我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中的切身体验。可以看出，几十年的熏陶和濡染，在我的灵魂中留下了北大精神的印记。“人生感悟”以下各辑，虽多数不是直接写北大的，但也都与北大的血脉相通，都是从未名湖的思想清泉中流淌出来的。

文中所写其实都是有关我生活的这个大时代的内容，只是个人角度、个人视野、个人体验。这当然不免琐细零碎。但特点和优势正在于这“琐细零碎”四个字，因为从中可以看到历史的细部，也会感受到历史血脉的搏动。中国的史学传统，个人撰著的野史笔记，向来是

官修正史的补充和重要参照。我的这些“琐细零碎”的类似笔记的记录，对于研究北大的校史、中国现代教育史，以及研究知识分子的生态和心路历程，甚至对研究这个时代社会思潮的某些侧面，或许都不无小补。

写于 2015 年 10 月 20 日

定稿于 2017 年 7 月 15 日

目 录

序 01

001 燕园回眸

融进一滴水

——为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而作 003

世事沧桑话住房 009

我的书房 024

草棚大学纪事 032

难忘最是师生情 047

当教师是幸福的

——在八十诞辰祝寿会上的致辞 053

059 感怀与纪念

本色人生

——季镇淮教授印象 061

吴组缃先生的文品与人品 064

学问与童心

——忆念一新先生 073

乡音·乡酒·乡情 077

四十年苦短 080

083 教学与治学

文学史教学的活力和生气 085

指导研究生的两点体会 087

推荐我最喜爱的十种书 091

漫谈治学 097

书和读书人 104

让心灵和生活同样美好

——关于审美教育的随想 112

做精神富有的人 115

互联网时代的学术研究 117

123 感悟与人生

适性 125

摄影的魅力

——益智·健身·娱心 131

137 艺文杂说

要让人还手

——关于百家争鸣的一点感想 139

人们为什么认可并欣赏《空城计》? 142

不平等的偷情 148

书里和书外

——关于曹学与红学的断想 156

蒲松龄的反贪小说 160

解读和欣赏古典诗歌的津梁

——评《全唐诗典故辞典》（增订本） 164

169 序与跋

《聊斋志异》欣赏前言 171

《古典小说鉴赏》前言 176

走进古诗文的艺术世界

——《古诗文的艺术世界》序 181

《中国文学十五讲》引言 185

《中国四大古典悲剧》序 191

《细说聊斋》的写作动因和成书与出版的机缘 198

阮温凌《艺术形象探赏集》再版序 202

段江丽《〈醒世姻缘传〉研究》序 204

《文学名著选读》序 212

《唐求诗探》序 218

镜像之美

——李镜散文集序 223

李畅培《野老诗话》序 226

跟“找乐子”有关的两篇短序 233

239 语文漫话

语文素养与中学语文教学 241

《简笔与繁笔》的写作体会 263

迟到的回应

——答余绍秋先生《〈简笔与繁笔〉的语病》 269

培养兴趣

——中学语文教学给我的影响 274

词语使用与文化遗产

——从“文通字顺”和“入围”谈起 282

担起我们共同的责任

——读《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两个新增词后的感言 287

对恢复繁体字之我见 292

一份遗落民间的教育文献

——读一册解放区编的小学《国语》课本 296

301 雪泥鸿爪

洪堡大学——柏林的骄傲 303

神奇的山茶 306

艺术之宫瓦特堡 309

访巴赫故居 312

柏林的全国青年联欢节 316

美丽的斯德哥尔摩 321

瑞典——一个理想主义的福利国家 323

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汉学传统 327

韩国外大的中国文学研究 333

汝矣岛上赏樱花 339

后记 342

燕园回眸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融进一滴水

——为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而作

未名湖是燕园中的一道风景线，是远近闻名的幽美的自然景观；不仅如此，现在未名湖区还是国务院颁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自然景观和一个区域文物群体，未名湖是以自然风景、古建筑群和历史遗迹等构成的实体，虽然其中也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毕竟还是可见可触的。但对北大人来说，未名湖还有其不可见、不可触，而只能用心去感悟和体认的另一面：她还是一种象征。作为北大和北大人的象征，她体现着一种传统，一种精神，一种境界，甚至一种韵调。其间的含蕴非常丰富，说不清也道不明，但北大人都能感受到，或者更准确地说她存在于每个北大人的心中。

从自然景观的一面看，未名湖并不很大，也并不很深，要是从高空鸟瞰，如北京电视台从直升机上所拍摄的，只不过是绿树红楼环绕中的一勺水。但作为北大象征的未名湖，却是广阔的、浩渺的、深邃的，她涵容丰富，茫无际涯。在北大人的心中，未名湖既是秀丽的湖，又是壮美的海——精神和思想的海。

我从1959年来北大，到今年，已在未名湖畔整整生活和工作了

三十九个年头。我的前半生，也就是我的生命中的一多半，已经在这里度过；我的不管还有多长的后半生，也还将在这里度过。今年是北大的百年华诞，在百年的漫长历程中，我竟有三分之一还多的时间是同她一起度过的。想到这一点，我不仅感到充实，感到欣慰，而且感到幸福和骄傲。

一个人的生活道路，常常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但有时也靠机缘。我能到北大来工作，成为一个北大人，就完全是出于一种机缘。北大当然是我最向往的学校，高中毕业时参加高考，填报的第一志愿就是北大。考试的成绩据中学的班主任告诉我（当时学生本人不能得知具体的成绩）也相当不差，但不知道为什么竟没有被录取，却进了成都的四川大学。记得当时虽有遗憾，却并没有失落感，因为那时除了知道北大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外，对她的了解和认识还非常浮浅；而四川大学也是全国的重点大学，也很有一点名气。到了大学毕业分配工作时，要人的单位意外地竟有北大，虽然心向往之，但我填报的第一志愿却是新疆。那时争取去边疆是有觉悟的表现，是一种光荣，这样填报的不止我一人，大多出于真心，并不是装装样子。但宣布时我却被派到北京大学。这自然令我喜出望外。这种情况对于今天的年轻朋友来说，可能有点叫人不敢相信：我是服从组织分配才跨进北京大学大门的。没有经过争取，没有经过奋斗，应了一句俗语：“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不是机缘是什么？

不过这机缘的得来有偶然也有必然。偶然的一面，是这一年北大文科恰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没有毕业生；而四川大学和其他的一些全国的重点大学却是从第二年才开始改的。这就留下一个可以容我走进北大的机会。必然的一面，是由于政治风暴对北大的冲击。1957年开始的反右派运动，延续到1958年，北大中文系的年轻教师中有许多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师资队伍遭到严重破坏，急待补充。所以1959年同我一起被分配到北大中文系来的，还有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

东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重点大学的十几位年轻人。外校的毕业生一大批同时蜂拥进北大，这种情况，在北大中文系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从我被分配到北大工作这样一个既偶然又必然的机缘可以看出，北大的百年历程，至少在我所经历的这一段，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政治风雨的冲击留下了许多斑驳的印记。我到北大不久，就下放到京郊的斋堂去养猪（这一次是我自己申请争取的，这是北大下放到斋堂劳动的第三批），以后又是北大自身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是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四清”运动），接下来就是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在北大真是遍地烽烟，揪出了一大批所谓的“牛鬼蛇神”，横扫所及，如季羨林先生所记述的，连草木也不能幸免。我到北大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67年，17年间真正搞教学和研究学术的时间只不过三四年。虽然平心而论，这段生活（特别是下放京郊劳动的一年）对我也是终生难忘的，其中许多人生体验极其宝贵；但这对整个学校的教育事业和学术事业的破坏，对每一个人学术生命的浪费，也是不言而喻的。值得庆幸、也值得骄傲的是，经受了如此严重的破坏和冲击，由未名湖所象征的北大的传统、北大的精神，并没有被彻底摧毁，更没有从此中断。在长时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这种传统和精神，由历史本身证明，她的根底是既坚且深，是富于生命力的。

我在北大工作了将近四十年，同时也在北大学习了将近四十年，既做教师又做学生。梁漱溟先生没有到北大来念过书，而且连大学之门也没有入过，而眼光高远、胸襟开阔、提倡兼容并包的蔡元培校长聘他为北大教授。他在九十五岁时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感慨颇深地说：“我是由蔡先生引入北大而得到培养的一个人。”在北大教书而得到培养，在这一点上，我同比我年长两辈的梁先生的感受是完全相同的。我所得到的培养，一方面在课堂上，另一方面在课堂外，更多的是精神和风调方面的熏陶和感染，包括做人和做学问在内。

我到北大的最初几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那些日子，教学秩序相对比较稳定，许多我心仪已久、闻名全国的教授都还在开课。我先后听了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游国恩先生的“左传研究”，杨晦先生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吴组缃先生的“古典小说研究”和“红楼梦研究”，林庚先生的“唐诗”，季镇淮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朱德熙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王瑶先生的“鲁迅研究”等。他们渊博的学问，严谨的学风，诲人不倦的精神，甚至他们各具特色的教学方法，仪容风采，或平实或流畅或幽默的语言，都给了我极深的影响和感染。那时候教师之间的关系不像现在这样各忙自己的一摊、彼此间疏于往来，而是不同教研室、不同年纪的教师之间也多有接触、交流。记得我不仅向王力先生、游国恩先生和王瑶先生等都请教过问题，而且还不时有机会同他们“闲聊”。我同游国恩先生就曾在图书馆和系资料室的书库里聊过好几次，话题涉及非常广泛，但中心总是围绕着读书、做人。这样的谈话非常亲切，所获的教益又是在课堂里得不到的。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朱德熙先生对我和当时相当一批年轻教师的指导和帮助。我刚到北大时还不在于古代文学教研室，是教写作课，属于写作教学小组，编制在汉语教研室。负责指导我们的就是朱德熙先生。他对我们的最大教益是帮助我们培养起对语言的敏感，识别什么是好的语言，什么是不好的语言，学会看文章、改文章，自己实践并在教学中帮助同学建立一种健康的文风。他特别重视文章的准确、鲜明、生动。他的文章就是写得准确、鲜明、生动的典范，他是北大中文系研究语言而文章写得富于文采的著名教授。教写作的人首先自己的文章要写通、写好，这是朱先生对我们的要求。我后来能有一定的语文修养，文章写得还算文从字顺，明净而不芜杂，有一点点文采，就得益于在朱先生的指导下几年认真的写作教学。不仅是我，当时我们写作教学小组的许多同事，都是受益者。后来写作教学组撤销，分散到不同的教研室，有好几位成为全国知名的学者，文章都写得很漂